

浙产剧《小城大事》：造城，造梦，造自己

■ 闫伟

浙产剧《小城大事》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切入时代脉搏,以轻喜剧的方式讲述了月海干部群众如何通过拼搏奋斗的精神、敢为人先的创举,在滩涂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剧作呈现的不仅是一座新城从无到有的崛起路径,更是一个关于人如何挣脱土地束缚、成为城市主体并塑造自身命运的了不起的故事。

时代大潮成为创业热土

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在试点、探索和突破中推动城市建设。温州龙港作为“农民造城”的典型示例,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次独特尝试。《小城大事》正是将这一故事原型搬上荧屏,不仅诉说时代背景如何成为平民创业的热土,也将月海镇作为浓缩的叙事空间,对改革如何影响人民生活与集体命运进行了基于现实根基的生动摹写。

剧集一开始的叙事焦点便落在镇党委书记的竞选现场,通过人物之间的理念差异迅速构建出改革叙事的最小动力单元。作为受过系统教育的年轻干部,李秋萍着眼于未来的城市规划,所展示的城市建设规划图不仅是人物形象塑造的符号载体,也内在体现了一种根植于规范操作和长远考量的现代治理思维。相比之下,郑德诚代表的是质朴的基层智慧和动员能力,是另一种来自“土壤之中”的实践经验。正如剧情所揭示的,月海建设进程中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制度执行难题,而是牵连着百姓衣食住行与生计改善的复杂课题,而置于其间的造城者则在一次次现实困境中直面改革中的矛盾与考验。在这样的叙事设定下,尽管李秋萍与郑德诚在“建城方法”上颇有差异,却始终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展开行动,即让月海城真正从荒滩变为



《小城大事》海报。

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园。从前期的针锋相对到后期的通力合作,二人围绕整治城镇环境卫生等工作的碰撞与协商,不仅锻造出人物成长的角色弧光,也让改革叙事得以在人物行动中自然展开。

改革叙事作为《小城大事》的隐性支点,不但是剧情演进的深层力量、塑造人物关系与命运走向的核心因素,更在精神层面贯通了时代发展,引发了时代共鸣。

现实与浪漫的交融中,看见人的成长

《小城大事》的可贵之处,便是着力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人物塑造,将“人民建城”的实践逻辑具象化、结构化地勾勒出来。围绕月海建城的核心任务,剧中塑造了性格迥异、分工明确的核心团队。无论是做事谨慎、对数字与细节保持高度敏感的谭光明,还是性格外放、协调能力出众的解春来,以及踏实肯干、长期扎根一线的林冬福,均成为“月海造城”的参与者、见证者和体验者。另有女性创业者高雪梅、“万元户”钱昌远、个体

户三胖等一系列标识性很强的人物,同样奔走于改变生活的奋斗之路上。正是通过对这一系列人物谱系的精细描摹,《小城大事》得以构筑起鲜活生动的时代群像。

城市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人民主体性展开的过程。该剧的明线虽是基层干部如何带领群众从无到有的“造城”故事,但其情节的转折之处,大多围绕百姓是否愿意集资、是否选择迁居、是否参与建城等关键事件展开。细处来看,剧中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群像戏”:例如,在“集资建城”时,当郑德诚等人几近心灰意冷之际,镜头一转,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的人潮,带着他们手中的积蓄,主动投身于这场集体造梦实践;再如,在月海遭遇台风之后,剧集并未回避灾难的混乱与创痛,反而将镜头对准瓦砾之间,月海人民重新组织生活、修复家园的众志成城……凡此种种现实性与浪漫感相交融的叙事设计中,人民成为城市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塑造者,城市也由此成为人民共同经验与共同记忆的凝结体。

“贵妃出浴”“鲁迅夹烟”……公共艺术讨论频频失焦 真正“有伤风化”的是什么

■ 黄一迁

城市设置公共艺术作品,或彰显城市特色,或点缀市民生活,或吸引各方游客,凡此种种,其初衷必是积极向上、善意美好的。而随着网络的普及,就公共艺术作品而言,借助网络和社交平台的传播,其影响也开始跨越地域空间和存在时间的限制,并接受更广泛的评判。现下颇具热度的“贵妃出浴”,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其实已在华清池前“站”了三十多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网络舆论环境和传播方式发生改变,才引发了各种讨论。

公众从各个角度对公共艺术作品提出意见、需求,其中既有对其艺术水准的辨析,也有对作品应用场景和放置方式等方面的质疑,还有一些主观方面的评判。这些都使进入公共视野的艺术作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共艺术作品被更多人看见是好事,说明艺术得以借助更广阔的平台传播,这是创作者乐于看见的;公众越来越关注公共艺术作品的好坏,也是好事,这说明更多人开始有余力来关心艺术,并在艺术审美、对艺术的要求上有了质的飞跃。

公共艺术作品若是能做到外有颜值,里有内涵,还能和城市精神契合,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自然会受到人们的认可,

甚至成为城市地标。像伫立在青岛五四广场的“五月的风”,似一条条鲜红的飘带螺旋上升,构成“风”的意象,也似燃烧的火炬,充分展示了城市的历史足迹,又向当代人展示并宣扬“五四精神”。还有纽约华尔街的“铜牛”、杭州的“八少女”等,许多城市都有可圈可点的公共艺术作品。上海街头雕塑“打电话的少女”,曾被称为上海十大城市雕塑之一。少女的“电话机”被盗后,多少人为之心痛。后来雕塑家何勇也不负众望,在原址上重新将作品修复完整。可见,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不仅能赢得大众喜爱,更能在人与作品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结。

但也有一些作品走向了反面。例如近期洞庭湖巨型镜面艺术装置《浮土》,因缺乏对生态保护的考量而遭指责,最终被拆除。

被网友“讨伐”的艺术作品里,不少曾遭遇“冤假错案”。比如绍兴鲁迅纪念馆中的墙画被投诉,画中的鲁迅夹香烟被认为会诱导人们聚集吸烟,误导青少年;更有上海博物馆以馆藏文物“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为原型设计的发光冰箱贴文创产品,被质疑其隐射“福桃瓶”流落海外时被当成台灯使用的历史。这些质疑声,部分是对作品的过度解读、非理性发声。拥有敏锐的洞察和

表达的勇气,这值得肯定,但过度解读必定不妥。此外还有部分别有用心之人是借机炒作,博取流量。

回到被认为“有伤风化的”的“贵妃出浴”,真正使之有伤风化的,并非作品本身,而是少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那些伸向“贵妃”隐私部位的“咸猪手”,那些嘴角挂着猥琐的嬉皮笑脸,才是将作品推向深渊的真正凶手。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欣赏的确存在一定门槛,不少观众十分有必要增加基本的艺术素养,这与提升审美水平一样迫切和紧要。

当然,艺术素养缺乏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法国巴黎的拉雪兹公墓内,一位年轻记者维克多·诺瓦尔(Victor noir)的墓,同样遭遇不必要的“骚扰”。游客对铜像的大不敬,让艺术品鉴变了味。所以,有时作品本身并不存在问题,而是打开方式出现了问题。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一部艺术作品有不同理解是必然的,每个人自带不同的生命经验、文化背景、知识体系与情感结构,每个人看风景,总有自己的“滤镜”和视角。一部作品遭到曲解、误读也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公共艺术作品,相对藏于深闺的美术馆、博物馆里的展品,参观品评者更多——被安置

日常叙事里的改革精神

《小城大事》的深刻之处在于其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浇灌以日常琐事的雨露,从而生动展现了改革在基层是如何于细微处见真章的。通过这种日常化、生活流乃至于轻喜感的艺术表达,改革精神成为观众得以理解、能够共情的鲜活经验。

剧集对改革精神的艺术转化,奠基于对时代细节的真诚还原。如改革开放初期对“万元户”略带戏谑的称呼,不仅是一个历史名词的简单复现,更折射出特定社会转型期人们面对新生事物时交织着艳羡、疑虑与期盼的复杂集体心态。

改革画卷的整体呈现,也离不开那些最显本真的粗砺笔触。剧中,新组建的镇党委会班子连一处像样的办公场所都没有,只能借用民居,面对家徒四壁的窘境,剧作者以一系列近乎白描的方式,诚实记录改革起步阶段的真实境遇。在这一意味中,《小城大事》的深刻性还生发于敏锐捕捉并艺术再现改革进程中那种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勇气,如主人公面对归国友人考察时看到的小巷逼仄、鸡鸭遍地之景象,并未回避或粉饰,而是毅然直面“家丑”,并着力组织改善环境卫生问题。剧中对改革精神的阐发,还指向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月海镇干部群众没有“等靠要”,而是将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城镇的未来发展紧密捆绑,从而进一步彰显出敢闯敢干的建设情怀。这特别体现在一系列女性形象塑造上,如李秋萍、高雪梅等不仅突破传统框架,还被赋予独立、清醒且充满力量的时代光彩,进而拓展了改革精神的社会光谱。归根结底,《小城大事》以其面向生活的日常化叙事,有效回答了改革精神何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时代之问。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主任、《中国电视》执行主编)

让演艺新空间更“聚”更“野”

■ 罗磊

杭州乐堤港有一个特别的霓虹灯招牌——“疯狂理发店”。这不是真的理发店,而是喜剧院牌开心麻花打造的沉浸式剧场。观众围坐在一个复古理发店的两侧,中间就是舞台。一场“谋杀案”在这里上演,理发师、顾客个个是嫌疑人。观众不仅得瞪大眼睛找线索,还能直接“审问”演员,甚至被拉上台洗头、做美甲,彻底变成戏的一部分。最后,大家投票决定凶手是谁——这种剧本杀式的玩法,让年轻人直呼过瘾,不少人二刷、三刷。

在杭州,这样的非传统剧场正不断开花。开心麻花还在中央商城搞了互动喜剧《疯狂室友团》,在城西银泰演起了客厅喜剧《空降未婚妻》、公寓喜剧《一墙之隔》;本土的“大盒剧团”在临平银泰的地下街区开出了大盒沉浸艺术中心,《极夜》《燎原》《花好月圆》等多部原创沉浸式戏剧在这里常驻演出;脱口秀厂牌“松果喜剧”在湖滨银泰开拓了三个小剧场……

这些演出空间有一些共同的标签:直接驻扎在人流密集的商圈,仅剧场的室外招牌、演出海报也能获得路人极大关注流量;空间不大,以小剧场为主,演出中观众的能量场更为密集,而且演出空间灵活多变,充满动线,观众可以流动起来,与演员的距离更为亲密,增加了许多互动;除去脱口秀,戏剧演出并不聚焦经典戏剧作品,而多为互动性极强、结局走向不定的沉浸式戏剧,融合悬疑、剧本杀、密室逃脱、角色扮演等各种元素,场景性极强;此外,融合了让当下很多年轻人为之狂热的音乐剧。

这些新空间、新演出样式,正好戳中了当下年轻人的社交与体验需求,成了城市潮流文化的引爆点,也不禁让我们思考:杭州还需要怎样的新空间?

其实,打破传统舞台开拓演出新空间的探索早就有。法国戏剧大师阿尔托当年就要废除舞台和剧院,让表演和观众之间没有阻隔。美国戏剧大师谢克纳认为“所有空间都能用来表演”,他的《酒神在1969》(1969年)在一个车库里演出,观众跟着演员满场跑——这都是沉浸式演出的“上古版本”。更“野”的探索是直接把剧场搬出城市。比如20世纪70年代,数个年轻剧团聚集在巴黎东郊文森森林的废弃军火库,将其改造为世界闻名的“军火库戏剧区”。

说到国内,上海的经验或许最值得杭州参照。2016年末,上海北京西路1013号“麦金侬酒店”剧场建成,根据《麦克白》改编的沉浸式戏剧《不眠

AI有“艺”思 莫让魔改解构经典

■ 李治钢

唐僧跳机械舞、雷锋形象被恶搞成搞笑背景板……这些由AI“魔改”的荒诞视频,正凭借算法推荐在网络空间肆意蔓延。不久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布启动专项治理,剑指四大名著、历史革命题材等作品的AI篡改乱象,这既是对文化底线的坚守,也引发了关于AI时代影视创作伦理的深层思考:技术红利面前,我们该如何守护文化的精神内核?

生成式AI技术的普及,让内容创作门槛急剧降低——只需几行提示词,就能将经典作品解构重组。部分账号深谙“猎奇即流量”的套路,刻意放大低俗化、颠覆性元素,把《红楼梦》的荒诞视频,正凭借算法推荐在网络空间肆意蔓延。不久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布启动专项治理,剑指四大名著、历史革命题材等作品的AI篡改乱象,这既是对文化底线的坚守,也引发了关于AI时代影视创作伦理的深层思考:技术红利面前,我们该如何守护文化的精神内核?

生成式AI技术的普及,让内容创作门槛急剧降低——只需几行提示词,就能将经典作品解构重组。部分账号深谙“猎奇即流量”的套路,刻意放大低俗化、颠覆性元素,把《红楼梦》的荒诞视频,正凭借算法推荐在网络空间肆意蔓延。不久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布启动专项治理,剑指四大名著、历史革命题材等作品的AI篡改乱象,这既是对文化底线的坚守,也引发了关于AI时代影视创作伦理的深层思考:技术红利面前,我们该如何守护文化的精神内核?

微评

微短剧不能催熟童年

部分儿童微短剧成人味十足,甚至让孩子演绎“替嫁新娘”等剧情,早已背离创作初心。新出台的监管政策为跑偏的行业乱象划定了明确红线。儿童微短剧的价值,在于还原童年本真,而非让红红绿绿包围童心。唯有让内容贴合未成年人的成长阶段,才能生产出真正善美的作品。

——西南大学学生 李心兰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之夜”落户。观众戴着面具在迷宫般的空间里追踪剧情,一票难求,成了文艺地标。更绝的是“南京路演艺聚集地”:一栋老旧的亚洲大厦,因为2020年入驻了环境式音乐剧《阿波罗尼亚》而彻底翻红,办公格楼层间变身小剧场,票价亲民,粉丝散场后堵着门等签名。很快,19个演出团体在这栋楼里驻场。趁热打铁,几年间相邻的大世界、第一百货、世贸广场都变成了“小剧场集群”,高峰时60多台戏同时上演——活脱脱一个“迷你百老汇”,在中国实现一场表演艺术与商业空间创新融合发展模式的前沿性实践。

反观杭州,虽然单个项目挺热闹,但缺的正是这种“抱团取暖”的聚集效应。一些作品形式很新,但场地主要还是散落在各个大剧院附属的小剧场里,没能形成合力。具体怎么干?笔者有几点“脑洞”:

培育特色的演艺聚集区。能否在湖滨、武林或钱江新城这样的人流心脏地带,或下沙大学生聚集地,规划培育一些演艺街区?把多个小剧场、沉浸式空间、配套餐饮文创集束起来,让观众一个晚上能赶好几场戏,形成持续的消费和文化吸引力。

把演出送到山野田间。浙江美丽乡村建设得很好,青山绿水本身就是绝佳舞台,青山村等地艺术节活动也越来越多,建议在各类乡村艺术节的基础上,引进团队驻地创作,开发一批常驻性的环境演出,让戏剧在山谷里、稻田边发生,或许能碰撞出更奇妙的火花。

主动引进爆款常驻项目。像《不眠之夜》那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对城市文化品牌的提升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杭州完全有实力和吸引力,去争取一些国内外优质的沉浸式或环境式剧目来此长期驻扎。

杭州不缺年轻的艺术创业者,也不缺艺术院校的人才,还需要狠狠扶持本土原创力量。应设立更多面向民营剧团和独立创作者的孵化计划,要投平,重点培育,打上“浙产戏剧”的标签。就像西戏出品的《无法访问》(虽然它最初源自上海的孵化计划),这样的本土原创力量,才是杭州演艺生态的根基。

杭州有着极具活力的年轻人群和最前沿的互联网基因,当“疯狂理发店”的霓虹灯接连亮起,大众将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孤立的亮点,而是一片足以照亮城市文化夜空的璀璨星河。是时候,让杭州的演艺新空间更“聚”一点、更“野”一些了。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电视与视听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科幻小说:脑洞之外,流淌着诗意与温情

■ 詹玲

在当下的中国文坛,保持了二十余年持续快速生长势头的科幻小说,堪称一道独特风景。回顾近段时间尤其是过去一年来的科幻小说创作,“温情”与“诗意”,可以说是除了“科幻”之外,科幻文学的图景中最打动人心、最值得品味的两个关键词。

诗意在理性基底上流动。近来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令人欣喜的艺术新突破,在于不少作品中流淌的诗意,让科幻想象在理性的知识基底之上,构建起灵动抒情的生命花园。

宝树的《俱乐部》里,身患“超激综合症”的主人公在心跳加速时能进入“主观延时”状态,却须承受剧烈痛苦。为此,他选择放弃爱情与梦想,安稳度日。然而,在旧爱陷入绝境时,他还是毅然发动全力为她化解危机,并永远以垂死之态停滞在了时间的缝隙中。小说的情感描写细腻而克制,将主人公对爱情的隐忍、对平凡的妥协还有对旧爱始终未熄的关怀置于平静的叙述中娓娓道来,却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时

被静流之下暗涌的遗憾、痛苦与不顾一切的激情润湿了眼眶。

如果说生命的诗意在上述这些小说里,是体现在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的之中,还有生死别别的刹那之间,那么在杨晚晴的《山之灵》、路航的《护鸟笛》等小说里,生命的诗意则是铺展于战火的血色浪漫、人与自然的技术乌托邦,还有对存在意义的持续追问中。

此外,从神话中寻找诗意的源泉,是作家们赋予笔下科幻故事以传统文化的诗性精神的有效方式。陈楸帆的《神笔》里的AI神笔,如同《神笔马良》中马良的神笔一般,能画虚成实。然而,作家并未停留在天马行空的神奇想象层面,而是通过AI神笔如何作为语言模型来干涉物理时空的思考,揭示“物质与信息之间隐藏的共性——一种流动的、虚无的、递归的‘道’”,探讨了现代科学与传统道家哲学本质上的共通可能。

想象世界也有人情之暖。如今的现实社会里,新媒体与算法正在将人类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快餐化,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日益模糊,情感作为深植于人类身体感知、生理状态和行动

倾向之中的具身性存在,正在变得稀薄且难以把握。或许正因如此,科幻小说家们反而更加重视情感的表达。以近年为例,中国科幻小说里的情感叙事数量众多,且相较以往,更注重深度开掘情感的内里,凸显人情之暖。

杨晚晴的长篇科幻力作《金桃》与陈楸帆的《刺海》,均以少年主人公与伙伴的冒险历程为主线展开故事。少年间的友谊纯粹简单,温暖动人。以《金桃》为例,伊嗣欣赏英满的聪颖才学和高超的箭术,因而追随其左右;陈持弓则因英满对他的平等相待而深受感动,决心守护这份难得的情谊。三人一路守护金桃,共同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彼此间的友谊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与升华。

母子亲情在欧美科幻小说中出现得很少,华语科幻也不多,但不少作品都非常精彩。譬如阿缺的《虚影人生》,就是公一个聚焦母子情感展开的故事。主人公李同依赖虚影眼镜获取灵感、逃避现实,却从未察觉真正的灵感并非来自眼镜,而是与患病的母亲共处的点滴——她通过理解他的游戏世界,默默给予他创作养分。得知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母



青岛五四广场“五月的风”雕塑。 视觉中国供图